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寿潜及其《三通考辑要》

竺柏松

汤寿潜(1856—1917)逝世后近十年,他的知交张謇在《汤寿潜先生家传》中说,“君之所以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固自有本;其见于事为者末也,又不尽其所蓄”。所说汤寿潜之“本”与“所蓄”为何?张謇在文中未作明确回答。另外,汤氏在去世前一年,“自制遗诫付二子”,其中一方面说明他成年后“乃留心经制,推之世务”的历程;另一方面则谆谆教导:“性无有不善,成德实难;毋亏其所受,其必由学”^①。我认为,以上张謇所说的“本”与“所蓄”和汤寿潜自己所说的“经制”与“学”,主要指的史学而言。这也就是说,除“不忍徇禄以忘亲”^②的纯孝品德外,史学实在是汤寿潜立身行事之根本。因此,如果我们不研究汤氏之史学,就很难全面、准确了解其人其事。而《三通考辑要》即为反映汤寿潜深湛史学修养的代表作。但这部堪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相媲美,理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在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著中均未被提及,更未有人对之进行专门研究。

① 张謇:《汤寿潜先生家传》,见浙江萧山市政协编《汤寿潜史料专辑》(以下简称《专辑》)第127页。

② 同上。

一、汤寿潜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

过去一般人说汤寿潜“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张謇认为,这些“皆君之末也”。现在对汤氏的评价,或称其为“早期维新思想家”,或称其为“近代立宪派代表人物”,但无人称其为历史学家。而实际上,汤寿潜首先应是一个历史学家。

在汤寿潜一生中,对史学用功最勤、费时最久。汤氏一生致力于史学,乃深受浙东学风之影响。在清代形成的以黄宗羲为创始人、章学诚为殿军的浙东史学学派对浙东学风影响深远。梁启超曾说:“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① 汤氏继承了浙东史学“业必贵于专精”和“学业将以经世”的特点,从 1874 年 18 岁开始,直至 1899 年 43 岁这 25 年间,用主要的精力从事于《三通考辑要》的编纂工作。“三通考”是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嵇璜和刘墉等领衔修的《续文献通考》以及《皇朝文献通考》(现称《清朝文献通考》)。以上三书共 898 卷^②,约 1294 万字,确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巨著。对其进行研究辑要,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汤氏当时的研究条件十分艰苦:一是他本人无“三通考”,当地也借不到,而只有到杭州“向坊肆赁读”^③;二是全靠自己一人穷日继夜地摘抄,且灯光昏暗,食不果腹,结果“目光从此耗损矣”^④。汤氏连续不断地到杭州赁读摘抄“三通考”,从 1874 年至 1885 年共有十一年之久。《三通考辑要》初步编成后,又“去取增损,累有更定”^⑤,直至 1899 年以 76 卷 30 册篇幅出版。历时二十余年,费时不可谓不久。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初史学之建设》。

② 汤寿潜在《三通考辑要自序》中说“三通考共八百六十六卷”。这是计算上的错误。

③ 汤寿潜:《三通考辑要自序》,见《三通考辑要》,上海图书集成局 1899 年版。

④ 同上。

⑤ 同上。

1886年后,汤氏进入仕途,但亦始终未与史学脱离。1895年汤寿潜出任青阳知县三月余,即以亲老辞归;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省都督,1911年11月8日就任,12月14日即提出辞职,1912年1月15日正式辞职,前后任职仅68天。其任职较长的是浙路公司总理,从1905年8月至1910年10月约5年余。但这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他自己认为是“所任非才,……用所非习”^①。所以虽然路事繁忙,他仍不改其学者本色,念念不忘做学问。1906年,他为了重新校刊严铁桥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写信给著名学者俞樾,要求“凡唐以前文,皆愿得乞写其副,以备纂录”,说:“年来虽役役于路,不费丹黄,终思以暇日一竟其业。”^②这也是一个类似于《三通考辑要》的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大工程,惜乎未竟其功。

汤寿潜的史学著作除《三通考辑要》外,还有刊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宪法古义》三卷。这实际上是一篇为当时的新政造舆论的史学论文。它“胪举东、西国宪法所许之权利,一一证以中国古书”,说明“宪法为中国所固有”,“不得谓中国古代曾无一人知宪法,亦无一言及宪法者也”^③。同年,他将“尤是裨《通考》之阙”^④、实际为乾隆至道、咸之间的《文献通考》——王庆云的《熙朝政纪》交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这对保存《熙朝政纪》这本重要的史学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前后所撰《刘含芳家传》、《徐烈士墓表》等十余篇传记作品,也都是事迹有据,议论恰当,史论结合的信史佳作。1913年出版的实际上是汤寿潜与其女婿马一浮一起编纂的《舜水遗书》(现改名为《朱舜水全集》),为明末清初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汤寿潜的史学造诣深得当时的学界与政界人士的赞许。为《三

① 《汤寿潜致汪康年函》,《专辑》第736页。

② 《汤寿潜致俞樾函》,《专辑》第554页。

③ 汤寿潜:《宪法古义叙》,《专辑》第466页。

④ 汤寿潜:《熙朝政纪叙》,《专辑》第469页。

通考辑要》作序的俞樾、袁永日、刘锦藻等知名学者对汤氏无不交口称赞。另外,从现存汤寿潜 1892 年光绪壬辰科会试硃卷中,可见该科会试正总裁翁同龢和副总裁李端棻等对他史学造诣的充分肯定。翁同龢对汤氏硃卷总的评语是:“茹古涵今,经策渊懿”;而李端棻的评语是:“熔经铸史,经策明通。”^① 在有关井田制的硃卷后,“本房加批”为:“于古今田制税则,实能洞其症结,贯其源流,假题发挥,觉马端临《田赋考》、恽大云《因革论》有斯翔实,无斯瑰玮。”^② 而汤氏所作《策题五道》均是旁征博引、言之有据的上乘史学论文。特别是第二题对新、旧《唐书》异同得失之比较研究,汤氏记忆力之强与史学史知识之渊博,尤足令人惊叹!无怪乎“本房加批”称其为“气息结构,纯乎子元,挹其醇粹,醴其偏霸,洵苞才、学、识而有之”^③。当时汤寿潜是一位普通考生,又是在考试场合,身为会试正副总裁的翁、李和其他阅卷大臣大概不至于会故做溢美之辞。时人曾把汤寿潜与夏曾佑一起称为“浙江双璧”,我认为,主要也是指他们都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而言。

二、汤寿潜编纂《三通考辑要》的目的与动机

关于编纂《三通考辑要》的目的与动机,汤寿潜在该书《自序》中有明白的说明。

一是为“便读者”。首先,汤氏认为《通考》基本包括《通典》、《通志》内容,因为“马氏后于杜、郑,茵席《通典》、《通志》以作《通考》,故杜、郑所作,《通考》得而苞括之”。因此,“学者读‘三通考’,如尽读《通典》、《通志》矣”。其次,汤氏认为“三通考”卷帙浩繁,“非数十万泉不能致”,“寻常未易购”;即令能够,也携带不便,“亦不克卒

① 汤寿潜:《会试硃卷》,《专辑》,第 427 页。

② 同上,第 432、445 页。

③ 同上。

读”，故有提要钩元，加以节录之必要。二是为“拯时”。汤氏认为，编辑该书，不仅“以便读者，亦拯时之苦心乎”。因为在汤寿潜看来，史学或掌故是政治、法制之基础。因此，离开历史、掌故来谈政治、时务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他说：“彼东（笔者按：指日本）、西国法科尚知斟求我国掌故，曾中国学子徒震眩于彼之艺学，绝不思有学始有政，有政始有艺，政之不存，艺将焉附？前车屡折，来轸方遄，夫使上之所求，下之所习，宪古证今，咸务实用，人人能《春秋》决狱，《尚书》治河，谁谓时事竟不可为？”^①后来他又在《熙朝政纪叙》中说：“今日之掌故，即当日之时务，士生今日，喋喋言时务，而于掌故之荦荦大者，且张口如堕云雾，岂非数典而忘其祖者哉！”^②袁昶最先在《三通考辑要序》中说《通考》是“掌故海”，汤氏亦同意此说，说“《皇朝通考》，当代掌故海也”^③。汤寿潜的一些著作如《危言》、《理财百策》、《宪法古义》等都是将“掌故”与“时务”结合起来、以史论政而写成。汤寿潜在《宪法古义》中证明“宪法为中国所固有”的托古改制做法，固然不甚可取，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汤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病立宪为异制而挠之者，愿以是间执其口也”^④。这反映了他“拯时”的良苦用心。三是为了纠正以前各种《通考》节本之“讹漏”。对《通考》作节录在清初已开始。在汤寿潜自序中提到的三种《通考》节本是：康熙初年郎星等所为《正续文献通考纂》、常熟严虞惇的《通考详节》和海盐胡震甲、胡震亨兄弟所作《通考抄》。而实际上，除上述三种外，还有出版于嘉庆甲戌年（1814年）的瞿曾所辑《正续文献通考详节》。该书将《通考》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分别节录，“篇删其节，节删其句，句删其字，去肤存液”^⑤，颇有特色。汤氏当时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

① 汤寿潜：《三通考辑要自序》。

② 汤寿潜：《熙朝政纪叙》，《专辑》第469页。

③ 同上。

④ 汤寿潜：《宪法古义叙》，《专辑》第466页。

⑤ 瞿曾：《正续文献通考详节序》，光绪二十五年湖南书局校刊本。

汤氏所说的“讹”，主要是指以往节本有如下错误：一是文字上的错误，如严虞惇《通考详节》把“而后可行贡法”讹为“而后贡法可行”，把“莱”字误作“菜”字；把“鲁宣公”讹为“鲁哀公”等。二是目录上的错误，如郎星等的《正续文献通考纂》，“‘道统’之文系十九卷，而目系二十卷”、“‘溢法’之目讹作‘山陵’”等。汤氏所说的“漏”，一是指胡震甲等《通考抄》“专抄论说，都凡源流，付之盖阙”。二是节录过多，“三者视元本仅及什一，或更不及”。三是指三个节本都没有对乾隆时编的《续通考》和《清朝文献通考》进行节录，而这部分正是“当时得失之林”，是政学家所应该“肄及”的。

三、《三通考辑要》之价值及再版之必要

关于《三通考辑要》之价值，当时为之作序的俞樾、袁昶、刘锦藻等人已对之作作了客观而全面的评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袁昶认为，汤寿潜的《三通考辑要》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们都是前书作者之“功臣”，而汤较袁还稍胜之。他说：“温公书主编年纪事，……文繁理陋，……非有吾祖机仲侍郎因事起讫、录大遗细为之《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则读者苦其文成亿万，义指数千，端绪不明，即无由操之以决事，故《纪事本末》乃《通鉴》之功臣也。”而马端临《文献通考》，“读之者苦寻究一事猝难得其要领，于此能以记事提要、纂言钩元之法为之，岂特贵与之功臣哉！然非熟精儒先义理之学、贯穿历代会要之编者，恶能任之，”^① 这就是说，作《三通考辑要》之难度超过了《通鉴纪事本末》。

袁昶还认为《三通考辑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是今后从事变法者所必须借鉴的书。他说：“讲明所以与时损益之义，所谓驭古今之变者，则于‘三通考’乎详之。”又说：“正朝夕者视北辰，别嫌疑者

^① 袁昶：《三通考辑要序》。

视圣人,不知来视诸往。智者之行法如禹之治水,常因势利导,行所无事;其变之也有渐而不失其大常,不于是编取之而谁取乎?”^①

俞樾则强调了《三通考辑要》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与价值。他说,“载籍极博,自昔病之,以‘九通’之法无津涯,得此书为之精骑,宏通之士必从此出矣”^②。

刘锦藻指出《三通考辑要》“购读俱便”的价值。他说:“‘三考’固治乱之镜,损益之卷,编为辑要,购读俱便。”^③

笔者认为《三通考辑要》有再版之必要。

首先,《三通考辑要》其书现在已很难找到了。汤寿潜的家乡萧山市为筹备汤寿潜学术讨论会,曾向马一浮纪念馆借阅该书,而借来的书还“虫蛀驳蚀甚多”^④。

其次,现在要将记述我国从古至1911年典章经制变化的“四通考”都予再版,实属不易。所说“四通考”是指“三通考”外再加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四通考”共计1298卷约2000万字。它们曾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精装十巨册,但迄未再版。今天如能重新点校出版,从保存珍贵典籍、宏扬民族文化角度考虑,实属必要。但在目前,从一般读者着想,则先再版《三通考辑要》较为切实可行。因为汤寿潜的《三通考辑要》提要钩元,从内容看包括了上古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典章经制;从篇幅看,则只有76卷约284万字,只相当于“三通考”原书的五分之一。且在所有《通考》节本中,繁简适中,讹漏最少。

(责任编辑:王也扬)

(作者竺柏松,1937年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袁昶:《三通考辑要序》。

② 俞樾:《三通考辑要序》,见《三通考辑要》。

③ 刘锦藻:《三通考辑要序》,见《三通考辑要》。

④ 见《汤寿潜史料专辑》主编陈志放先生1993年12月2日给笔者的信。